

历史的呼吸

文 / 古镜

在本次人类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曾涌现过许许多多的文明形态，此起彼伏、遍及各大洲。但大部分就像流星一般，划过历史的星空，消失在时光的深处；或像是春天里的花朵，绽放一次即告枯萎，凋谢在历史的大观园内。最为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有三个早已是沧海桑田、面目皆非；而唯有中华文明像永不坠落的北斗，五千年来一直闪耀在历史的星空，给无数人文学者们带来无尽的幻想与思考。

欧洲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面积，但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国家变迁。许多的国家曾经存在过，但又消失了，也带走了其文化与历史。今天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其历史多是在数百年之间，有的更短，而中国却已经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时光，虽然政权时有更替，但文明却长盛不衰，文化恒久不变、连续传承。

俄罗斯人在庆祝其彼得堡建城三百年之际，中国的苏州城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古老这一词汇在各自民族的语境里有着巨大的落差。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也可以说是神迹。她之所以又叫作神州，也许就是天上诸神最为眷顾的国度吧。那么如此一个庞大的国度，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民族，不同的风俗，究竟是什么力量能让他维持五千年之久，而不至于分崩离析呢？即使在曾经遭受几百年的分裂之后，也能一朝春来，重新山河一统、盛世降临呢？在这神迹的背后，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文明密码呢？

答案就在于，中国历史有一套独特的运行机制，这套机制就是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的一句经典名言：“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很多中国人虽然是耳熟能详，但只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看待，并没有思考过其背后的原因。其实这句话说的并不准确，历史上有时没合多久就分了，有时分了不久就合了，笔者更愿意将其称作分合机制，而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机制。那么天下之势为什么会分分合合呢？其分合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历史上的大部分国家分了就不能合呢？笔者愿与大家就此作一次分享与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历史上合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有人说经济的因素，有人说地理的因素，也有人说政治的因素或军事的因素。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在多次的分裂之后重新一统，决定性的力量是文化的融合力与凝聚力。而其它方面的因素只是在表面上的一种展现，它们虽然能对统一起到临时的作用，但这些外在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一种文明持续五千年长盛不衰。

文化各国都有，为什么单单中国的传统

文化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呢？依笔者来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乃神传文化，以这种文化构建的中华文明是一种高层次的文明形态，对其它低层次的或原始的文明有着天然的向心力与同化力，所以才能在历史的巨大变迁中立于不散、不败之地。而世界其它地方的民族文化都是一种在地上形成的人类表面文化，同等层次的文化之间是没有制约力的，当一种文明被征服或灭亡时，他的文化也就会被取代，文明也烟消云散、无法复活了。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不会跟着政权变，政权却会跟着文化变。

历史上每当中原王朝陷入分裂时，文化就像是看不见线，连着人们的心，一旦分裂各国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重新一统则顺理成章。而当外族势力征服中原时，文化又像是强大的能场，把他们同化于无形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他们的政权则成了中国的一个朝代。中华文化中重视家庭的传承，却不太注重种族的分别，这也使得民族间的融合畅通无阻，任何民族都能在不改变其基本风俗的情况下，溶入中华民族。既然内部力量与外部势力都无法撼动中华文化，自然中华文明也就绵延不断了。

具体的说，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潜藏着大一统的信息密码：重要的如汉字的使用，使得不同的区域或族群在社会心理、伦理道德、文化认同上获得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能超越语言、独立表意的文字系统把人心紧紧的拴在同一个理念系统中。还有对正统的推崇，使得天下定于一尊的观点深入人心，分裂是不得已，统一永远是人心所向。

儒家修齐治平的君子教化，也给了无数中国精英们统一天下或维护中国一统的人生信念。还有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对人心的凝聚力，中国人都把自己说成是炎黄子孙，即使在国家分裂时，人们的内心并没有分裂，天下一家这种心理给国家统一提供了强大的社会精神支撑。其它还有服饰、礼乐、宗教等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对大一统起到支撑作用。

既然中国文化有强大的统一力量，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中国又会有多次的分裂呢？依笔者来看，这和人心有直接的关系，和社会的发展有关系，和中国的国情也有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文明，一旦在人间立足，就必须有一套政治制度来维系，而制度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人心制定的。

随着社会在人口、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还有人心的变化，其不适应的因素与负面因素都会在旧制度中形成堆积，原有的一套制度就会日久生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弊端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社会的肿瘤，阻碍国家的正常运作，这时就需要变更制度来解决问题。

但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形不同，

人心的自私都会使种种利益集团在制度变更时利益纠集，难形成一致，这时暴力就会介入，分裂或改朝换代也就登场上演了。

人间不是天堂，大部分人都是执著利益的，能主动放弃权力的当权者历史上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王朝因为自己的腐败而主动让出政权的。连周武王这样的大德之君，都要以武力才能解决商纣暴政，所以古代兵征天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是无法避免的。

当分裂成小国之后，各国在制度上的探索与变更就会容易的多，由此会逐渐发展出合乎当时经济、人心的制度来；或者是当原有的利益集团被新兴的政权摧毁之后，一切制度上的改良就会顺利铺开。如果新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很快就会导致新一轮的社会动荡，历史上的西晋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就是明证。

制度变更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人心的变化。从中国五千年的政治演化来看，制度是越来越繁杂，其实是人心越来越复杂、道德越来越下滑的表现。而中国自宋代以后，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们私心越来越大，士人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直至满清帝国，形成了皇帝独裁与满族专权的政治格局。

康乾盛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康熙、乾隆两位明君的个人治世之功。一旦圣王不在，满清帝国也就急速的走向没落，在西方崛起的宪政面前，显的效率低下又腐败不堪。其之所以又支撑了一百年，还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力量。

人间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不坏的制度，因为人心就是不完美的。历史上的每一次分裂其实是制度积弊的结果，也是制度变更的需要，但是这些制度的变更都是在礼乐政治（治理模式）或天子政治（政治架构）这一大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每个朝代的政治制度都有所不同，但从大的方面讲，他们都是属于儒家天人合一的政治架构，都以礼乐刑政为其政治基础，都是在传统文化主导下的政治设计。

在这其中，两次长期的分裂酝酿了两次大的制度变更。一次是春秋战国近五百年的分裂动荡使得中国由世袭封建制过度到中央集权制；一次是通过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中国由士族门阀制度变成科举精英制度。其他次的短期分裂制度的变更也相对较小，汉承秦制，只是以儒立国、废除了法家的政治流毒；唐承隋制，只是对前朝的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宋代创造了文官制度的典范，而元代由于制度上的混乱，很快就被逐出中原。明代宰相被废，皇权扩大；满清干脆是皇帝独裁，政府效率越来越低。

在这些政权的更替里，唐宋之间的转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一个是武功盖

世的大唐帝国，一个是文华四射的大宋王朝，一个是雄镇东方、万邦来朝，一个是开国局促、强敌窥伺。中国的社会与人心也从此由阳转阴，从拓疆扩土的史诗时代过渡到内守收缩的宋词格调，中华文明的原创力逐渐衰减，先天的文化元气渐次衰弱。儒释道三家的修炼文化慢慢演变成了一种人间学术，所以文化的气象、境界越来越小，投射到政治上就是越来越收敛与闭关锁国，直至满清后期的抱残守旧、不思进取，帝国在一片残阳中等待又一次的变局。

如果把中华民族整体上比喻为一个生命，他已经是一个五千岁的文明寿星了，他之所以长寿的秘诀就在于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始终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信念。一个人需要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才能正常生存；而一个民族要想长久驻世，也需要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所以中国历史的分合机制，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呼吸，有时绵长而悠远，有时急促似管弦；靠这种独特的生命机制，中华民族才能时时吐故纳新，保持民族的活力、守护着自己的文明，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然而这种历史的呼吸到了民国时代产生了急剧的起伏，来自西方的许多变异因素开始渗入。由于一些精英阶层的信念缺失、盲目崇洋，导致中华民族吸入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剧毒——马列主义，呼出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由此新生的中华民国就无法再合了。

发生在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运动），无疑就是一场自断民族命脉的文化自杀运动，科举被废除、读经被停止，民国人自废武功、自撤防护屏障，自然也就无法识别、无法阻挡异端入侵，国家开始被一种政治邪魔附体上身了。

1949年，中共篡得中华神器，马列病毒攻入了中华民族的大脑中枢，以此迅速的扩散至全中国。亿万炎黄子孙们被一波又一波的马列党文化运动蛊惑、麻醉，许多人卖身为党奴，成了马列魔族的一员而毫无知觉。

中国大陆的民族精神已亡，文化已绝，整个民族被中共屠杀、洗脑、变异、妖魔化，历史的呼吸至此休克，只是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保存了一份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真可谓气若游丝、命悬一线！

然神护神州、天佑中华，上天并没有抛弃对中华民族的眷顾。二十年前，法轮大法的洪传使得上亿中国人入梦初醒，心灵又接上了民族文化之根、从新与天地相连。真、善、忍的修炼理念为中华民族注入一股强大的宇宙元气，在红魔当道的无边黑夜里，民族精神还魂回阳，历史的呼吸从新启动，开始了新一轮的吐故纳新，中华民族必将在与马列邪魔的惊天搏斗中获得新生，迎来崭新的纪元。◎

过年的来历

文 / 翔龙

过年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相传人们之所以把这个节日叫过年还来源于万年历法。

其实，我国在远古时期就有年的概念。“年”的甲骨文写法为上面部分为“禾”字，下面部分为“人”字。金文的“年”字与甲骨文相同。而现在已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的“禾”字，几乎都是看上去沉甸甸地被压弯了腰，可见它象征着取得谷物生产的大丰收。

“年”字下面的“人”字又作何解释呢？从甲骨文看，“年”字好象是人头上顶着沉甸甸的谷子的样子。

相传，远古时期虽知一年有四季，但节令不准。有个名叫万年的人便想重新计算调整，于是，苦思冥想好的计时方法。一日，上山砍柴坐在树荫下休息时，日光下树影的移动使他受了启发而设计了用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准确地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他又受山崖

上的滴泉的启发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就这样经过反复推演，万年发现四季轮回一次需要间隔三百六十多天，天时的长短会重复一遍。国君祖乙知道此事后大喜，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希望万年能测准日月规律和准确的晨夕时间。

几十年过去了，一次，祖乙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此时，已经满面银髯的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岁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就把岁首叫过年吧。”这样就有了过大年。祖乙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并封万年为日月寿星。据说，现在人们在过年时所挂的寿星图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

万年。

传统意义上的过年，是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廿三、廿四的祭灶，直到正月十五日上元节结束，部分地方也会把整个正月纳入过年的范围。每年从农历腊月初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扫尘日”，所以有民谚：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因“尘”与“陈”谐音，新年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过年扫尘的风俗。

过大年的中心日子是除夕和正月初一，因为这一天是新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所以称为“三元”；因为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称“三朝”；又因为它是第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朔”。

人们会在正月初一拜大年，但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多数家庭均不



接待妇女，谓之“忌门”。仅限于男子外出拜年，妇女则须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外出走访。拜年之风，汉代已有。

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此后，还有正月初二祭财神以及正月初五过破五节的诸多说法，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上元节。整个过大年就算进入尾声了。

其实，整个过年的节日是人们迎新除旧的重大日子，在这个日子里，人们除了放松一年的紧张和疲劳外，最重要的是祭祀诸位神灵和自己的祖先，为自己的来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